

文字书写与 性别群体

湖南江永女书群体研究

于皓 贡贵训

著

WENZI SHUXIE YU XINGBIE QUNTI
HUNAN JIANGYONG NÜSHU QUNTI YANJIU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字书写与

性别群体

湖南江永女书群体研究

于皓 贡贵训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责任编辑:潘 安

封面设计:陈 爽 王艺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书写与性别群体:湖南江永女书群体研究/于皓,贡贵训著.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676-2220-3

I. ①文… II. ①于…②贡… III. ①女书—群体—研究 IV. ①H123②C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6069号

文字书写与性别群体:湖南江永女书群体研究

于 皓 贡贵训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ebsfxb@126.com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11.5

字 数:200千

书 号:ISBN 978-7-5676-2220-3

定 价:23.0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女书群体形成的条件	15
第一节 女书群体形成的地理环境	17
第二节 女书群体形成的人文环境	24
第三节 女书群体形成的心理条件	36
第三章 女书群体的内涵与特征	46
第一节 社会视角下女书群体的内涵与特征	46
第二节 文化视角下女书群体的内涵与特征	49
第四章 女书群体的结构	58
第一节 女书群体的规模	59
第二节 女书群体的角色	66
第三节 女书群体的行为规范	71
第五章 女书群体的关系	77
第一节 女书群体的内部关系	77
第二节 女书群体的外部关系	82
第六章 女书群体的功能	85
第一节 女书群体对个人的影响与作用	86
第二节 女书群体的社会功能	94
第三节 女书群体的互助功能	103

第七章 女书亚文化的反思与愿景	109
第一节 女书亚文化的反思	109
第二节 女书亚文化的愿景	118
附 录	124
妇女亚文化视角下的女书群体特征	124
女书和谐社群的现代启示	130
女书歌谣中的女性形象	136
江永女书的文化生态及文化传承	146
高银仙、义年华女书作品选注	155
主要参考文献	176
后 记	178

第一章 绪 论

在风景秀丽的湘江之源，有一个神奇秀丽的地方——江永。江永位于湘南边陲，东与湖南江华、南与广西富川、西与广西灌阳、北与湖南道县接壤，巍峨的都庞岭和萌渚岭环绕四周。江永故称永明，因永明岭而得名。

江永历史悠久，很早就有人类活动。

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王翦戍都庞，请准设营浦县，属长沙郡，县北部为营浦地。

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在县西南置谢沐县（县内有谢水、沐水，故名），属交州苍梧郡；同时析长沙郡，置零陵郡，营浦改隶荆州零陵郡。县内西南部建谢沐县，县治先后设于甘棠、圳景、白塔脚、潇浦（今城关镇）。

三国（吴）甘露元年（265年）至南北朝，谢沐属临贺郡。营浦属营阳郡。

隋开皇九年（589年），并谢沐、营浦为永阳县，属永州总管府。

唐武德四年（621年）属南营州。贞观八年（634年），置道州江华郡。天授二年（691年）复置永阳县，属道州。唐天宝元年（742年），以永明岭（今都庞岭）定县名，改永阳县为永明县，属道州。

北宋建隆元年（960年），永明属湖南路道州江华郡。宋熙宁五年（1072年），分允山、允平、文德、谢沐、永川、崇福六乡入营道，兴化一乡入冯乘（今江华），废县为镇。元祐元年（1086年）复置永明县，属湖南路道州江华郡。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永明县属岭北湖南道道州路总管府。

明洪武元年（1368年），永明县属湖广布政司永州府。洪武九年（1376年），隶永州府道州。明复乡、里（都）、甲。

清康熙三年(1664年),永明属湖南布政司(后改省)衡永郴道永州府。

清雍正十年(1732年),永明属湖南省衡永郴桂道。清设乡、都。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永明县属永州府。中华民国4年(1915年),废府州,保留道,县属湖南省衡阳道。中华民国24年(1935年)改设区、乡镇、保、甲。中华民国26年(1937年)12月,湖南省划为9个行政督察区,永明县属第九行政督察区。中华民国29年(1940年)4月,湖南省调整为7个行政督察区,县属第七行政督察区。中华民国33年(1944年),黄沙湾及龙虎湖南街划给恭城县。

1949年,永明和平解放后属永州专区。1950年5月,永州专区改称零陵专区,永明县属之。1950年10月—1951年4月,富川县朝东区和恭城县栗木区划归江永县。

1952年,撤衡阳、零陵、郴州专区,成立湘南行政公署,县属之。1954年,撤湘南行政公署,置衡阳、郴县两个专区,县属衡阳专区。

1955年冬,江华沱江区、大路铺区、白芒营区、桥头铺区和沱江镇划归江永县。

1956年3月,改永明县为江永县。1962年复置零陵专区,江永县仍属之。1979年,零陵专区改称零陵地区行政公署。

1995年废零陵地区改置永州市,江永县隶属至今未变。

在江永县上江圩乡、城关镇、黄甲岭乡、铜山岭农场等地,历史上流传着一种特殊的文字——女书,女书字体纤细秀丽,只有点、竖、斜、弧四种笔画,书写时右上高左下低,斜体修长,呈现出长菱形的特点,造型别致,秀丽清癯,古意盎然。女书是现今发现的世界上唯一只有女性使用的文字,因其外形像蚊子、蚂蚁,当地百姓也称为“长脚蚊字”或“蚂蚁字”,又因其专为妇女所用,学术界便将其称为“女书”。女书一般书写女性之间的特殊情感,女人视之为私密之物,平时不轻易示人,死后一般焚毁随葬。特殊的交际功能和保存习惯使得女书没有古代文物流传于世,史志亦无载录,所以很难确定其起源时间。

女书在当地为人们所熟知,但学术界对其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

曲折的过程。

目前可见有关女书描述最早的应是在曾继梧编写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1931年)中。该书“花山”条中说:

花山,在层山岭之麓。石玲珑若花然。相传唐时,谭姓姊妹学佛修真,入山采药,相与坐化于此,土人于山顶立庙祀之。石既罗列有致,加以崇林美荫,磴道缘石罅以出,升降忘劳。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歌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

其中的“蝇头细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女书”。

《女书——一个惊人的发现》记录了女书被学术界关注、研究的详细过程。在1958年前后,有一位江永女人到了北京走亲戚。到了北京后不识路途,而她说的话极其难懂,让她写字,写出的字也非常奇怪,没人认识,人们只好请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帮助她。这个妇女写了一些字,公安人员拿着这张纸找到了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周有光仔细辨认一番,也不认识。这位公安人员就拿回有女书的纸张告辞了。这是女书第一次进入专家视野。

周硕沂是较早关注、研究女书的学者之一。周硕沂有个姑姑嫁到江永县的上江圩,小时候他常跟祖母到姑母家去做客。他看见妇女们有的拿着扇子等东西聚集在一起边读边唱,非常好奇,就问姑姑扇子上面画的是什麼,姑姑说是女书。1954年,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周硕沂结识了上江圩乡葛覃村的胡池珠(“池”有作“慈”的)。胡池珠精通女书文字,且有不少写有女书的物件,周硕沂从她那里得到了一些女书原件,他在1956年已整理出女书300多幅,但后来因故中断。到了1959年,江永县编写了《江永县解放十年志》。在这份材料里,有一篇摹写的女书作品和关于“妇女字”的简要介绍,这些介绍性的材料就是由周硕沂提供的。20世纪80年代初,周硕沂重新回到县文化馆工作,县文化局委托他编写《江永县文物志》,在1982年刻印的初稿中,有“蚊形字”一节,初步谈到了女书的流行地域、使用范围、记录土话等特点。

1982年,中南民族学院(现在的中南民族大学)青年教师宫哲

兵在湖南南部进行民族文化调查。江华瑶族自治县上游乡的负责人黄祖蓝告诉宫哲兵，他的家乡在江永县消江乡白水村，那里四五十年代流行一种特殊文字，只有妇女懂得，称为“女书”。根据这条线索，宫哲兵从江华县到江永县去调查，果然在消江乡白水村找到了一份女书物件。女书文字写在一块长约两尺、宽约一尺的浅蓝色的布上，大约有800字，内容是这件女书巾帕的主人何西静一生的苦难经历。

宫哲兵到县文化馆，请周硕沂担任向导，在上江圩乡进行了几天的调查。根据胡池珠女儿提供的线索，打听到上江圩乡蒲尾村有胡池珠的两位结拜姊妹：高银仙和唐宝珍。高银仙已是81岁的老太太，听说是调查女书，当时就兴致勃勃地在一张纸上写了几十个女书文字。写完后拿起纸就吟诵，并将这些女书文字的意思一个一个地说明。老人说家中有十几本女书书本，保存了几十年，从家中拿出三本。这三本女书，每本大约长五寸，宽三寸，由20页左右的黄纸线订而成。每页纸从上而下、自右而左写满了奇特的文字。高银仙说，这三个本子的名称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三姑记》《王五娘》。《梁山伯与祝英台》讲的是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悲剧故事。《三姑记》描写三姑嫁给一个穷人后勤劳致富的故事。《王五娘》描写五娘出嫁后受到婆婆虐待的故事。高银仙不将家中其他女书拿出来，原因是其他女书大多是结拜姊妹之间的通信，其内容不宜让外人知道。宫哲兵将高银仙、唐宝珍两位老太太一起接到县城里，请她们读女书，讲女书文字的意思，终于将《梁山伯与祝英台》逐字翻译成汉文，并录了音。根据这次社会调查和收集的女书资料，宫哲兵撰写了《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公开发表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报告对女书文字的性质、结构、功能、使用、传授以及当地的语言、文化、民族、民俗等情况提供了调查材料和初步的分析意见。自此以后，女书开始为世人所知，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在美国第1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研讨会上，会议主席、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哈里·诺曼说：“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女书不仅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其独特的文化现象也引起了影视从业者的兴趣。2011年，由邓文迪与米高梅公司老板娘斯隆监制、著名华裔导演王颖执导的影片《雪花秘扇》由上海电影集团和福克斯探照灯联合出品。2014年，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

目播出了关于女书的节目，节目主持人带着女书的扇子走进江永县了解神奇的女书，通过寻访何静华、蒲丽娟、林莹三代女书传人，为观众解读这种女人独有的闺房密码。

我们一般所说的女书大概有这样几个含义：一是指文字本身，这种字在当地人心目中是女性专属字，与一般汉字相对应；二是指用女性专用文字创作、书写的作品；三是指用这种文字书写而成的作品载体，如布面手写本（婚嫁礼物）、扇面、布帕、纸片等。女书本身是一种外形奇特的字，记录的是汉语和南方少数民族语言融合的一种土话。女书所负载的文化信息非常丰富，值得我们关注。

关于女书的性质，学界有过很多的争论。但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类：一是古文字孑遗。如有的学者从字形的角度出发，认为女书是与甲骨文一样古老的文字；有的学者根据女书中一些字符与仰韶文化出土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类似，认为女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二是与古代少数民族文字相关。如有人根据女书中一些符号与壮族、瑶族等民族织锦上编织的图案类似，推断出女书字符中蕴含着造字者的崇鸟意识，认为女书文字的创造与古百越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三是认为女书是在汉字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变形、简化等创制而成。

就目前来看，通过女书字形与汉字的比较，我们认为女书是根据汉字的形体改造而来，这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女书和汉字的性质不同。汉字是表意文字，女书文字记录的是当地土话的音节，同一个形体可以记录多个同音字，而这个字的意思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因此，宫哲兵、赵丽明、陈瑾等认为女书是表音的音节文字^①。谢志民则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女书是一种“罕见的记号文字”^②。

① 在《试析“女字”形、音、义的特点》一文中，作者认为：“女字”的一个字形表示一个音节，每个音节表示这个音节所代表的一切语素（或）词。“女字”中形和义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和我们使用的汉字不同，汉字是一种形音义统一的符号，一个字一个音节，同时又表示一个意义单位（词或语素），而且读音是由意义去确定的。……“女字”在这一点上不同，每个字形所表示的音节是固定的，而音节所表示的意义是该土语中一串同音的语素。见宫哲兵：《妇女文字和瑶族千家峒》，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42-60页。

② 在《论“女书”文字体系的性质》一文中，作者分析了“女书”字符的造字法和用字法之后，提出“女书”字汇中的绝大部分字符与它所标示的音义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一形多音，一音多形，字符对音义的标示仅凭约定俗成。因而流传在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乡一带汉族妇女中的“女书”并非“表音文字”，而是一种罕见的记号音节文字。见谢志民：《论“女书”文字体系的性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第1-6，9页。

有关谁是女书第一个发现者和研究者的争论由来已久，袁思永、曾继梧、潘慎、周硕沂、李正光等人都自认为或被当做是发现女书、研究女书的第一人。如果以公开发表论著的时间算，周硕沂在1982年4月编写《江永县文物志》，其中有“女书之歌”，详细介绍了女书；1982年12月宫哲兵在湖南南部进行民族文化的调查，回校后撰写了《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湖南瑶山采风记》，发表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女书研究已经过去了30多年。在这30多年中，女书引起了各个领域学者的关注，一度成为热门话题，直至今日，研究热度依然不减。纵观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

一是资料收集与整理。资料收集是开展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早期的研究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谢志民于1991年出版《江永“女书”之谜》（上中下三册），该书根据女书传人高银仙的读解录音，逐字标音注音，所有资料一律采用原件复印，保持了女书字形原貌；与王利华合作于2002年出版《女书发声电子字典》。赵丽明分类整理了429篇作品，并对其进行逐字逐句的注音释义，于1992年推出《中国女书集成——一种奇特的女性文字资料总汇》，2005年推出《中国女书合集》，后者所汇集的资料比较齐全，占目前所能见到的女书原始资料90%以上，与他人合作于2006年推出《女书用字比较》，介绍其文字系统内部（造字、用字、异体字）研究价值、女书交际用字研究（个体用字量、个体差异、共识度）研究价值、方言研究价值、理论价值等，并得出基本结论：女书是方块汉字的变异，女书是音节（字符）表音文字，并对女书基本字数定量以及女书的产生时代给出基本结论。陈其光收集大量的女书原件复印件摹写件，从中整理出女字3400多个，汇编了《女汉字典》。该字典不仅注明女字的形音义，而且详细分析每个女字的演变过程，形象直观地展示了女书与汉字之间的演变关系。江永女书本地研究者周硕沂编的《女书字典》（岳麓书社2002年版）也是较为重要的工具书。谢志民、谢燮于2009年推出《中国女字字典》。该字典所收女字均采自女书流传区熟谙女书的妇女1990年以前撰写的女书原作，包括历史遗存的女书文本、高银仙和义年华的女书书信抄件、高银仙本人撰写的女书作品、义年华前期撰写的女书作品等。条目以单字为主，共收女

书单字2 345个,严格保持字符形体结构的原貌,注音以已故女书传人高银仙、义年华的实际读音为依据,均采用国际音标。该字典附有《女字字部目录》《女字检字表》。

二是从语言文字学角度对女书进行研究。文字的识读和语言的研究是其他研究的基础,因此,要想在其他学科研究上获得突破,必须解决语言问题。早期的女书研究者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这方面的研究颇受关注。女书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文字?女书的源头在哪里?女书是什么时代产生的?女书是瑶族文字还是汉族文字?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广大的研究者。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论断。

女书最初发现的时候,宫哲兵根据女书流传地区的人口构成,提出女书是与平地瑶有关的瑶族文字^①。后来他与严学窘合写的《湖南江永平地瑶文字辨析》仍持此观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宫哲兵、赵丽明等逐渐倾向于女书是一种汉族文字^②。关于女书的产生时代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是上古时期产生的文字,如李荆林认为女书起源于史前陶文,其依据是女书中的图案字与彩陶图案有很多字形相似甚至相同^③,潘慎和梁晓霞认为女书起源于原始母系社会,是古代刻画文字的母字^④,谢志民认为女书是商代古文字的孑遗演变^⑤。宫哲兵的观点与上述不同,他分析了女书的史志文献、女书物件及内容后,认为女书起源于明清时期^⑥。同时,他从文字形体的角度分析,认为女书所借用和改造的汉字,多为简化

① 在上江圩流行的江永土话(女书)实际上是或古代曾经是平地瑶的一种语言。见宫哲兵:《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湖南瑶山采风记》,《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第122-128页。

② 关于女书所记录的语言,近几年经过语言学家的调查研究确定,它既不是湘语西南官话,也不是瑶语,而是一种流行于湘南桂北粤西北五岭(大庾岭、骑田岭、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地区的汉语土话。见赵丽明:《女书与女书文化》,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③ 李荆林:《女书与史前陶文研究》,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④ 潘慎、梁晓霞:《原始母系社会的文化——江永女书》,《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第72-77页。

⑤ 他在《“女书”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孑遗和演变》一文中说,根据“女书”保留的古文字特点、“女书”字符和金文字之间的类同与规律性对应现象,论证“女书”系文字至迟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存在。见谢志民:《“女书”是一种与甲骨文有密切关系的商代古文字的孑遗和演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6期,第59-64,73页。

⑥ 女书的实物和作品最早追溯到咸丰年间,读纸读扇的活动最早追溯到嘉庆年间,女书的传人最早追溯到乾隆年间,可见女书的产生期,很可能是清初或者明末。见宫哲兵:《女书时代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5期,第59-63页。

字，仅有部分为繁体字。简化字古称为俗字，而宋元俗文学的流行正是俗字得以流行的前提，到了清代，俗字已经非常流行了，这也可证明女书创造时期应在宋元以后，很可能在清代。

三是女书文本研究和女性主义的研究。当女书的文字解读达到一定的程度，而其产生年代和产生的环境问题又难以定论的时候，人们把研究的重点逐渐转移，其中女书文本的解读和女性主义的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宫哲兵在《女书所反映的妇女生活》一文中，通过对女书文本的分析，还原了江永女性的成长交际、节日、婚姻、宗教信仰等生活状态^①。张晓佳认为，女书文本中反映了女性在“公共领域——祭祀”“私人空间——结交”“时间——历史参与性”三种空间的主体意识。台湾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刘斐玟以西方文本理论为基础，发表了系列文章来探讨女书中的表意深度，从而揭示其中性别、阶层、音声、权力、展演和史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认为通过女书的书写和吟唱，妇女们可以游移于传统礼法社会和权力结构内外，女书在展演文本的情境中，暗地里开辟蹊径，为已婚妇女建构另类认同的表意空间。纪军认为女书叙事诗所显露出来的对于男女平等的呼唤，对父权制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以及对女性历史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女权主义的核心思想。彭阳则认为群体性的聚会交流，使得压抑在当地女性集体无意识中的改变创造等元素苏醒，为女书的产生提供了强大的内驱力。钟云萍认为女书是父权压迫下女性反抗的产物，父权制压迫为女书的产生提供了潜在的动力，江永妇女婚姻上的苦恼甚至生活中的烦闷有了排解的方法。

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产业开发研究。女书被是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女书赖以生存的土壤发生了变化，女书自然传人一个个离去，“自然的女书”实际上即将灭亡。人们对女书的保护和开发的工作非常重视。2002年4月，女书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06年6月，女书习俗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学界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其中何华湘的博士论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研究——以女书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对女书的保护开发进行了理论上的探索与阐释，并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要

^① 宫哲兵：《女书所反映的妇女生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第46-51页。

求设计了符合我国国情的传播策略。贺夏蓉的博士论文《多重视角下的女书及女书文化研究》深入分析了女书及女书文化传承的危机,对当下作为民间文学的女书及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女书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进行了深入思考。

五是其他方面的研究。当女书研究进展到一定阶段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各领域的学者从自己的学科出发开展学术研究。如乐伶俐《教育学视域下的女书及其传承》一书从女性视角出发,运用教育学的理论,认为女书学习是一种教育活动,女性以女书为中介而学习,走出了中国传统女性教育的困境,形成了女人自己教育女人的别具一格的教育路径。李庆福、李福昌研究了女书的书法流派和审美价值。周飞战运用女书的形体,分析了女书图案的艺术特征^①。又有人从音乐角度对女书民歌进行研究,如廖宁杰、吕频、王志军等人。于皓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认为女书群体属于一种典型的妇女亚文化群体,这种群体的形成以当地封闭而富饶的自然环境和当地妇女内在的精神需求为条件。女书群体是感情相投的女性自发组成的,群体成员之间感情深厚,凝聚力很强,表现出一定的稳固性。同时,女书群体在纾解成员郁闷情绪、提升群体成员的社会地位和知识修养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自女书被发现以来,相关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仔细分析后,我们发现目前的研究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关于女书起源的问题依旧未能解决。关于女书的起源,学者众说纷纭,民间传说有很多种。在江永流传较为广泛的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瑶姬改编天书造出女书。瑶姬是王母娘娘的小女儿,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聪明伶俐,深得王母宠爱。平时瑶姬的言行举止,活泼任性。她要做的事,谁也不敢阻拦,就是王母也得让她三分。一天清晨,宫女们都未曾起床,瑶姬早已梳洗完毕。掀开霞帐,推窗启户,只见人间一派明山净水,鸟语花香,田园阡陌,泉美林秀,炊烟袅袅,人流熙熙攘攘,比起天宫要自由得多。瑶姬早

^① 周飞战认为,“女书图案图文并茂,形式多样,其编织、挑花、刺绣工艺历史悠久,复杂多变。透过女书图案的形态与色彩,使我们看到了女书人细腻的情感世界与文化世界”。见周飞战:《女书图案的形式及其艺术特色》,《美与时代》(中),2010年第7期,第76-78页。

想离开烦闷的天宫，寻一个清静处逍遥自在。如今下界的美景展现在眼前，撩得她心神激荡。她决定到那里去探个新奇。于是她离开了天宫，足踏祥云，飘飘然下到这个地方，这就是浦美村。瑶姬与下界的人语言不相通，可是凡人待客特别讲究礼仪。尤其是姑娘个个心灵手巧，聪明能干。虽然语言不通，但相处甚好。

人间的姑娘们擅长描花绣朵，纺织花带、花被。瑶姬非常佩服，于是拜她们为师。瑶姬觉得这里的姐妹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文化，不识字，言不达意，意不能书。瑶姬想帮助她们提高记事的能力，便回到了天庭，把一套复杂的天书搬了下来。姐妹们虽然想学，但一个个目不识丁。瑶姬把这深奥的天书简化，并与女红刺绣结合起来，用当地的土语读唱，使这些姐妹们一个个能识善写，作诗绘画，读唱自如。自此，这个改变了的天书在女人中间传递，男人不屑一顾，不识也不用，因此就定名为“女书”。

第二种是九斤姑娘造字。传说很久以前，上江圩一农妇生下一个女婴，体重九斤，故取名为九斤。九斤姑娘自幼聪敏，纺纱绩麻，织布绣花，无所不会，无所不精。她还异想天开地造出了写土话的女字。所以义年华在回答来访者时说：“只听前人讲古话，九斤姑娘最聪明，女书本是姑娘做，做起女书传世间。”

第三种是荆田胡氏皇妃传书说。据上江圩一带妇女传说，古时候荆田村胡家出了位皇帝娘娘，有的说是唐朝，有的说是宋代。荆田有个姓胡的姑娘叫胡玉秀（一说叫胡秀英），才貌出众，被选入宫中作皇妃，有的具体说是宋钦宗的西宫娘娘，在宫中受到冷遇，七年只被宠幸三晚，万般凄苦，想给家人写信，又怕被太监发现，便创造了女书。她把这种字写在手帕上，向母亲和要好的姊妹诉说起在宫中的苦楚，托人把手帕带回家乡，并告诉亲人看信的秘诀：第一要斜着看，第二按土话读音去理解意思。从此这种文字便在家乡妇女中流传开来。

第四种是盘巧姑娘造字说。相传在很久以前，桐口山冲里出了个叫盘巧的姑娘。她三岁会唱歌，七岁会绣花，长到十七八岁，没一样女红不精通。她绣的蜜桃、柿子，小孩见了流口水；她绣的山茶花、映山红，蜜蜂分不清真和假。村里的姑娘们都喜欢和她在一起绣头巾、织花边；新娘出嫁摆歌堂，一定要请盘巧领头唱，一夜唱到大天亮，从来不重复。村里的老年人都说，盘巧那么聪明，一

定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但盘巧听了很伤心，因为村里姐妹不认字。就在盘巧十八岁那年，一场大祸临头。有一天，盘巧在山上割草，官府的猎队发现了她，把她抢到很远的道州府去了。她喊破了喉咙也没人听见，要捎口信也无人帮忙，要寄书信不会写，请人代笔更加难。盘巧想，求人不如求己，世上的字也是人造出来的，何不造一种文字，向亲人诉说苦情。她根据与姐妹织花边、做鞋样的图案，三年的时间共造出一千零八十个字。盘巧用自己造的字写了封长信，藏在一条由她养大的猎狗身上，带给家乡的亲人。那条猎狗通人性，到了桐口山冲就东家进西家出，终于一位心细的姑娘发现狗颈下有信，打开一看，她像读天书，于是她邀集四十九个姐妹，想了四十九天，才把盘巧写的信认了出来。从此，姐妹们用盘巧造的字编歌，又好记，又好认，代代相传到如今。

第五种是神台买书说。据河渊村的人讲，女书最初从道县传过来。桐口、荆田村以北十里外的道县新车乡有座庙，传说很早以前，有一家父女三人采药路过此地，两个女儿实在太累了，在地上一坐不起，父亲也因悲伤死在这儿。后来这里人杰地灵，人们到这里祈拜可以消灾祛病，人们便为他们父女盖起了一座庙。哪家有病痛、哪家媳妇不生育，到庙里拜过，病没了，灾去了，孩子也有了。一传十，十传百，附近的女人都来祭祀求福。神台上有绣花小红鞋，没有小孩的拿一只回去照样做一双，拿一双回去就做两双，做了鞋就会有小孩，生了小孩再把鞋送回庙里。神台上还有女书，烧过香，化过纸，就可以拿一本回去看，叫“化纸买书”，读过后可以拿来换。最早的神台女书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丝线绣在绸子上，一卷一卷的。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拿了女书回去要照抄一份，跟年纪大的妇女学认、学唱、学写，以后可以用女书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出来，悄悄送到神台上，让别人去读、去写。

我们虽然可以通过上述的民间传说发现一些信息，但传说毕竟是传说，不能作为学术研究的最终依据。因此，有关女书起源的问题，在目前依然悬而未决。

其次，女书研究方法单一。早期的女书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字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同领域的学者参与了进来，但是，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学科出发来开展研究。我们知道，女书是一种综合文化现象，解决语言文字问题虽然是研究的前提，但在

文字的基本性质、识读问题解决后，研究应该进一步深入。而实际情况是，目前我们可以见到的大部分重要成果集中在资料收集和语言文字方面，关于其他方面的研究虽然有，但缺乏有影响的论著，尤其缺乏从不同学科出发、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女书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成果。

再次，从女书文本与当地生态环境关系的角度，关注女书使用者生活环境与女书关系整体研究缺乏。女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产生、发展、繁荣乃至消亡都有其客观条件。妇女群体是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妇女之间的情感倾诉、相互依赖是其繁荣的土壤。由于前述的原因，女书缺乏比较古老的文献资料，我们无法通过文本材料了解女书的过去。因此，了解当下当地女性的真实生活状态，对还原历史真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书以社会学的“群体”概念为立足点，用社会学解析群体的方法来研究女书这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社会学家所说的社群（community），广义而言是指在某边界线、某地区或某领域内发生作用的一切社会关系。它可以指实际的地理区域或是在某区域内发生的社会关系，也可以指存在于较抽象的、思想上的关系。其鲜明的特征是有稳定的群体结构和较一致的群体意识；成员有一致的行为规范、持续的互动关系；成员之间分工协作，具有一致行动的能力。

社群理论其实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传统的社群理论主要立足于“社团”等群体性概念，强调集体性、社会性组织对于个人的重要性。生产力水平越低下的时代，人们越倾向于以团队的形式出现，因为这样更容易应对可能存在的自然侵害和来自群体之外的伤害。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1887年出版的《社区和社会》一书中指出，社群是基于自然意志（如情感、习惯、记忆等）以及基于血缘、地缘和心态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有机体，其中的每个人各拥有自己的成员资格，并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这些社群中寻求各自的归属感。……与社团和社会不同，社群的主要标志不是契约和利益，而是人们的出身、地位、习惯和认同。桑德尔认为，社群告诉其成员的不是他拥有什么，而是他是什么，社群不只是他们的一种属性，而是他们身份的构成部分。所以，“比起手段型和情感型的共同体